

2

文化 中国 与 世界



# 文化：中国与世界

(第二辑)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文化：中国与世界》

### 编 委 会

顾 问：杨周翰  
李泽厚  
庞 朴  
主 编：甘 阳  
副主编：苏国勋  
编 委：于 晓 王 炜  
王 焱 王庆节  
甘 阳 刘 东  
刘小枫 孙依依  
纪 宏 余 量  
何光沪 苏国勋  
陈 来 陈平原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胡 平 赵越胜  
徐友渔 郭宏安  
阎步克 秦晓鹰

(以姓氏笔划为序)

# 目 录

---

## 中 国 文 化 研 究

- “以意逆志”法的源与流 ..... 张伯伟 (2)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之一
- 说“诗史” ..... 陈平原 (43)  
——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
- 中国绘画与中国文化 ..... 杨煦生 麦荔红 (69)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  
问题 ..... [美] 杜维明 (100)
- 十七世纪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 ..... 萧萐父 (141)

## 比 较 文 化 研 究

- “道”与“逻各斯” ..... 张隆溪 (148)  
——关于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论所作批判的评注
- 中国“诗言志”论与西方“诗言回忆”论 ..... 王一川 (167)  
——兼论中西诗的起源与特质
- 语言与存在 ..... 胡伟希 (204)  
——中西方思维方式与心智深层结构

## 西方文化研究

### 胡塞尔：通向先验本质现象

学之路 ..... 倪梁康 (236)

——论现象学的方法

### 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外专稿)

..... [瑞士] 凯 恩 (325)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主要

概念译名讨论 ..... 陈嘉映 王庆节 (338)

——《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后记

### “突入澄明之境”(海外专稿)

..... [美] 萨利士 (352)

### 《存在与虚无》——萨特的伦理

世界观体系 ..... 陈宣良 (366)

——《存在与虚无》译后

### 传统·影响·误读 ..... 唐小兵 (400)

——哈罗德·布鲁姆对立实用批评理论述评

### 论奈瓦尔诗中的分裂与循环 ..... 金丝燕 (431)

### 诗人何为 ..... 刘小枫 (467)

——论德国新浪漫派诗群

## 文化学基本理论

文化学 ..... [美] 怀 特 (496)

文化的整合 ..... [美] 本尼迪克特 (505)

本辑文章英文提要 ..... (517)

# 中国文化研究

# “以意逆志”法的源与流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之一

张伯伟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以意逆志”法的产生及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文章从春秋时期赋《诗》制度的衍变以及战国时“诗言志”观念的巩固等方面，尤其是从先秦儒家文化精神的角度阐发了“以意逆志”法的产生背景，并将这一方法在汉代到清代的发展过程划为四个阶段，即以群学的“意在言外”为特征的两汉时期，以玄学的“言不尽意”为特征的六朝时期，以美学的“言近旨远”为特征的宋明时期和以集大成为特征的清朝时期。通过历史的考索，文章指出了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弊端所在，因此，必须汲取西方文艺批评的某些方法予以改造和拓展，而这种改造的可能性，也正是传统批评方法生命力的表现。最后，文章将“神话批评”与“知人论世”相结合，以李商隐的一组诗为对象作了实例分析。

作者张伯伟，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届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现留校任教。

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方法是丰富多彩的。在众多的批评方法中，有三种方法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精神，这就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佛道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研究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特征，并进而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同时，采用融铸中西的途径对传统批评方法加以拓展，以现代的新知去引发古典的智慧，不仅在实践上能够避免某些由于一味追新而造成的偏差，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艺批评方法体系。

不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方法有其特殊的困难，因为从形态上来看，它们都是非理论的，而且大多蕴藏在具体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中。“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不仅是禅师示法的偈语，<sup>①</sup>也同样被文学家和批评家奉为圭臬。<sup>②</sup>因此，我们只能从大量零散的材料中去发现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轨迹。本文将首先对古代文艺批评中的“以意逆志”法加以探讨。

—

春秋时，公卿大夫宴享之际需要“赋诗言志”，各诸侯国使令在外交场上也需要“赋诗言志”。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据统计，《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所载者凡五十三篇，而重见者尚不在其列。<sup>③</sup>《诗》在许多正式场合中成为一种彼此交流思想的媒介。考其原因，至少有三点：其一，当时的贵族阶层对三百

篇都非常熟悉。在宴享或揖让之际的赋诗，往往是“断章取义”，<sup>④</sup>赋者随其意而“断章”，观者则能就其文而“得义”。例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六卿为韩起（宣子）饯别，“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产赋《野有蔓草》，赋义取自首章结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所以宣子立刻就说：“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对他的美意表示感谢。子产赋《羔裘》，其诗有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用以赞美韩起，所以宣子马上谦逊地回答：“起不堪也。”由于他们对《诗》的熟悉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所以，《诗》也就成为当时贵族集团中的共同语了。而少数不学之徒，则只有甘受嘲弄。<sup>⑤</sup> 其二，春秋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语言都有差异，在外交场合中，彼此酬酢揖让之际，如果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则势必需要“翻译”。刘向《说苑·善说》就记载了楚国鄂君子皙听不懂越语，“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从史籍记载上来看，周代设有译员，<sup>⑥</sup> 但主要是从事于与少数民族的交往。至于各诸侯国使令间的交往需要翻译，则未有所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至秦则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周、秦皆在西部（《吕氏春秋·音初》即以秦音代表西音），其声为夏声，夏、雅字通，夏声即雅声。周人得天下，便以其地之方言为列国君卿大夫之正言。三百篇列为官学，而诵《诗》必用“雅言”，也就是“普通话”。《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笺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不可有所违。”可见，孔子诵《诗》，乃用周人之雅言，而非鲁国之方言。又春秋时，晋国在北，楚国在南，各处其偏，而楚地方言与中原语言差别颇大。《左传·襄公

二十七年》记楚薳罷赴晋涖盟，赋《大雅·既醉》，赞美晋侯为太平君子。以情理推之，其赋《诗》也肯定是用雅言而非方言。正因为诵《诗》必用“雅言”，所以能在各种场合下自由运用。其三，《诗》多用比兴之辞，往往发言于此而寄意于彼，这就便于当时人的引证发挥。赋诗言志，很少符合诗的本意。如《召南·摽有梅》，诗的本意乃在男女婚姻及时，而《左传·襄公八年》记宣子赋此诗，乃取其中“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二语，以表示希望鲁国及时出兵共讨郑国，与男女及时之意毫不相干。这与《诗》的修辞特色是分不开的。

春秋末年，“赋诗言志”之风衰落，孔门《诗》教，除了将三百篇备作专对以外，更主要的是用来修身。《论语》中涉及到《诗》的共有十九条，其中孔子论《诗》的有十条，论《诗》而兼及礼、乐或言礼、乐而兼及《诗》者有六条，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这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意在其他学派看来也是这样。如《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又《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而从孔子论《诗》中，还可以发现他透过文字去推论诗人的心志。《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此推论的是诗人之意，这与春秋间“赋诗观志”所重的赋者之意判然有别。这一转变当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而《论语》记载的孔子论《诗》正透露出此中消息。

进而论之，“诗言志”的观念在战国时期乃日趋巩固。从字源学角度来看，“诗”和“志”皆以“口”得声，而一从“心”，一从“言”。在古文字中，“心”和“言”正属于偏旁互易之例，因而很可

能它们原是一个字。<sup>⑦</sup>但在春秋战国之际，“诗”和“志”早已分化为二字而各有其用。“诗”为“言志”的工具，这一意识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不过这里的“志”指的还是赋者之志，以下几段材料中的“志”则是作者之志。《今文尚书·尧典》：“诗言志。”<sup>⑧</sup>《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sup>⑨</sup>《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sup>⑩</sup>所谓“志”，在古文字中代表“识”，<sup>⑪</sup>又可以训为“意”、“心”、“念”等等。所以“志”可以理解为是见识、意旨或心理。“言志”也就是“言识”、“言意”或“言心”。孔子以《诗》为教材，诗人之志与礼、乐在他看来是一致的。《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无邪”，就是根据《诗》中“志”的内容而下的判断。那么，诵读诗三百，也就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无邪”的境地，<sup>⑫</sup>从而实现儒家所提倡的“修身”的目的。

然而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诸子纷争的时代，儒家虽为显学，但决不定于一尊。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物非但不能为其他学派所接受，而且可能受到挞伐。春秋时“赋诗言志”的传统虽然不行于战国社会，但这种摘句比附、断章取义的方法却在诸子著作中体现出来。舜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人物，法家则不以为然。《韩非子·忠孝》：“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并以《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句为据，认为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这种说法在战国时颇为普遍，而咸丘蒙也以此意向孟子。它涉及到如何理解《诗》意，并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舜的形象。<sup>⑬</sup>于是，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法。《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而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朱熹解释曰：“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sup>④</sup>“以意逆志”重点在要求说者不拘泥于文字，而是透过字面去推测作者的用意。实际上，“普天之下”四句后二句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其意极其显豁。但战国时人彼此攻讦或自立一说之时，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并摘引《诗》句以证其说。这在孟子本人的著作中有时也是如此。但如果以这种方法来推原诗人之意，则必然是行不通的。从表面上看，孟子对咸丘蒙的问题似乎是答非所问，但他提出了这一说诗方法，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除此而外，孟子在《万章下》又有“知人论世”之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知人论世”是诵诗读书的升华。汉代以后，说诗者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结合起来，成为我国传统的说诗方法之一，并进而成为一种传统的文艺批评方法。春秋时“赋诗言志”，至孔子而一变为读诗明志（既明诗人之志，又使读者之志明），战国时引诗立说，至孟子又变为“以意逆志”。就其产生过程而言，诚如

上述。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提出，实与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或曰儒家的文化精神有关。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很直接，却具有潜在的本原性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文化精神；而儒家的文化精神，又主要偏重于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主要表现为人己之情的息息相关，在立身处世时兼顾主客。<sup>⑩</sup>这种精神固然充沛于死生之际，也同样洋溢于日常平淡之间。它所强调的是在体察对方的前提下安排自己的行为。儒家讲仁义，讲忠恕，讲反身而诚，都是这种道德精神的反映。《论语·雍也》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卫灵公》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仁和恕，都须在人我对待中体现出来。《学而》又记孔子的话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儒家所特别强调的是“知人”，而“知言”又是“知人”的前提。《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从“以意逆志”到“知人论世”，也正是由“知言”到“知人”的过程。而归根结底，乃是获得了某种道德。《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尚友”的目的乃在于尚其德。《孟子·万章下》：“友也者，友其德也。”这种“德”，乃是一种道德。《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所谓“志”，其内容也就是仁义。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他自己就是长于“知言”、“知人”的。《孟子·公孙丑上》自称“我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又《梁惠王上》，齐宣王对孟子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至于孟子解说《诗》中

《小弁》和《凯风》，也完全是藉以发挥仁义孝道。《告子下》：“《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凯风》，亲之过小者；《小弁》，亲之过大者。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礪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礪，亦不孝也。”后代批评家运用“以意逆志”法，往往特别重视诗中的政治道德意义，几乎成为一种传统眼光，溯其渊源，亦不得不谓滥觞于此。

从“以意逆志”法的形成来看，它不是为了文学批评，从孟子主观上来讲，他也无意于发明一种说诗方法。但是在客观效用上，它却体现出某些说诗的原则，并为后代的文学批评开其法门、示其津筏了。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中，对“人”和“世”的重视，正是导源于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孟子对《诗》也很熟悉。《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指出：“七篇中言《书》凡三十九，援《诗》凡三十五（案：援《诗》三十五次中有四次连引两篇，故实际涉《诗》数为三十九），故称‘叙《诗》、《书》’。”赵岐《孟子题辞》也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这也是孟子得以提出“以意逆志”法的主观条件之一。所以，后人在总结“《诗经》学”时，对孟子予以高度评价。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三曰：“‘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学诗必自孟子始。”

## 二

“以意逆志”法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即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代。每一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色，而这些

特色的形成，又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环境、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及文学观念有关。现分述如下：

### 一、两汉

经学与文学的浑而不分，导致了汉人以治经之法治文学。《诗》在汉代于“五经”中虽最早尊为“经”并立有博士，<sup>⑩</sup>但《诗三百》地位真正的提高，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置五经博士以后。汉代的《鲁》、《韩》、《毛》三家诗，从史籍记载上看，有说皆出于荀子。<sup>⑪</sup>西汉时，经今文学流行于世，而就《三家诗》而言，乃以《齐诗》最为显赫，<sup>⑫</sup>也以《齐诗》最能代表西汉经今文学的特色。儒学以齐、鲁为宗，汉代师儒也以齐、鲁最盛。《齐诗》之学固然出于孟子，汉儒之学亦可谓出于孟子。<sup>⑬</sup>从汉人说诗方法来看，其受孟子的影响更是显然的，而在汉代学术空气的熏染下，又有新的发展。

西汉人的言谈中有这样几句颇为流行的说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凌曙注曰：“《诗·汎历枢》：‘《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说苑》作‘《诗》无通故，《易》无通吉（伯伟案：“吉”当作“占”），《春秋》无通义。’”<sup>⑭</sup>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三指出：“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但是从《诗》、《易》、《春秋》三者并举来看，这几句话更可能是针对汉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sup>⑮</sup>的状况而言的。就《四家诗》来看，虽然在说解方法上都是“推诗人之意”，<sup>⑯</sup>但对于同一首诗，其所推之“意”、所逆之“志”却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诗》无达诂”说既是这种实践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推

动了这种实践。既然是没有达诂，经师们也就自可根据需要而各言其是了。

如果“《诗》无达诂”说与孟子“以意逆志”法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东汉赵岐的发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赵氏指出：

人情不远，以己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sup>②</sup>

这就是汉人所理解的“以意逆志”。就说者、作者及作品三者关系言之，在孟子主要是强调了“文”、“辞”与“志”的关系，即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到赵岐则对说者（意）与作者（志）的关系予以了更多的重视。与“《诗》无达诂”说比较起来，赵岐更突出了说者的主观性。

尽管汉人在具体分析“诗人之志”时有着千差万别，但他们对于“志”的理解却又是有着同一指向的。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sup>③</sup>汉代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经》、《楚辞》和汉赋。《诗》为五经之一，《楚辞》乃“依托五经以立义”，<sup>④</sup>赋又是“古诗之流”，<sup>⑤</sup>所以，汉儒在说解这些诗赋时，动辄“美刺”，几成套语。“美刺”不仅是他们“逆志”的着眼点，也是他们衡量优劣的标准。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例，《离骚经序》谓《离骚》“独依道德，以讽谏君也。”《九歌序》曰：“上陈事神之敬，见己之冤结，托之于风谏。”《九章序》曰：“风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招魂序》亦曰：“外崇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风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这可以代表汉人说诗论文的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归根结底一句话，是因为汉人以治经之法治文学，必须寻求作品的微言大义。

汉人对于“知人论世”的发展，比较明显地表现为在说诗时自觉地将它与“以意逆志”结合起来。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说：“及北海郑君（玄）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诗人之志也。”<sup>⑦</sup>郑玄《诗谱》虽早有残缺，但是经过后人的整理，<sup>⑧</sup>我们已能大致了解。他将三百篇按照写作年代加以排列，以便读者知其时世。这对后来影响极大。问题是汉儒对于诗赋的“美刺”意识太强，因而往往据此以附会史料，并将“史”与“诗”的关系直接化，就难免有许多龃龉不安之处。屈原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生平事迹可考的诗人，对其作品的说解，从汉人起就比较注重将诗人的生平与作品联系起来。但是从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可以知道，就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而言，其本质与汉儒说《诗》还是一致的。

另外，在汉人的创作中，有一点乃大堪注意。由于汉人认识到《诗经》、《楚辞》的以“香草美人”为比兴寄托的特征，所以，一方面在批评时寻求寄托之意，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也有意地摹仿这种手法。如张衡《四愁诗》，其序曰：

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伯伟案：此字据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五补）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sup>⑨</sup>

这种创作与批评的互为作用，遂使作者藉男女之词，寓身世之感，说者指闺房之言，作美刺之笺，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词与传统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以意逆志”法之长流不衰，此内在之必然性是断断不可忽视的。